

## 资本时代“心理一般”的方法论批判\*

王 波

**[摘要]** 本文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出发, 内在性地把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心理学研究及批判中如何可能, 以加深对传统心理学及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 心理存在不是直观的作为自然对象的物 (Ding), 而是作为客观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 der Personen)。在心理学中它表现为作为现代发明的“心理一般”。心理一般只有沉降到历史关系的具体层面, 才能完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跃迁, 以此勘破心理一般带来的双重幻象。对心理一般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与其虚假的同路人区分开来, 这个同路人就是从抽象的主体价值出发进行批判的抽象人本主义逻辑。

**[关键词]** 心理一般 具体心理 抽象心理 心理生产 **[中图分类号]** B023.2

心理学何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这是本文的核心设问。我们缺乏一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出发“内生性”地开出的对传统心理学何以可能及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研究。既然传统心理学常被指认为具有“方法论中心主义”的特征, 乃至与之相关的方法问题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焦点议题, 那么这种批判研究最具穿透性的切入点莫过于直指其核心, 即传统心理学所以立身的从具体到抽象的实证方法, 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从方法论高度反思心理学的前提与界限, 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

### 一、传统心理学的方法: 从具体到抽象

实际上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已明确区分了具体的可见世界和抽象的可知世界, 这造成了认识论上的二元分裂: 可感知的不真实, 真实的不可感知, 或曰直观的不本质, 本质的不直观。由此传统心理学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式被先行奠基: 仿佛我们日常所与的感性世界乃梦幻泡影, 只有理念化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本质的、客观的世界。日常经验被视为在认识论上处于下等地位, 在方法论上需要实验处理的具体的感性杂多。只有运用精密的数学语言将之表征为实验变量之间的抽象函数关系, 它才可能跻身科学的天国, 以寻求普适性的对人性进行描述、预测与控制的客观规律。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初, 就存在着这种变量心理学的抽象天国与具体生活世界间的二元对立。

必须牢固地站立在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大地之上, 才有可能解蔽心理学抽象天国的隐秘谱系。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人与外部世界依存关系的重大改变: 人类生存的直接物质条件从自然经济中的自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心理学思潮研究”(编号14CZX003)的阶段性成果。

物质条件，向商品经济中的社会物质条件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深刻的认识论革命。如果说在前者中存在着自然物质决定论所塑造的一直延续到英国经验论唯物主义的、对自然感性实体的直观，那么后者则形成了一种社会经济决定论。社会历史的客观现实主要不再是物质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以人类活动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柏拉图两个世界的分裂给心理学造成的认识论困境，在这种经济学语境中被革命性地重新理解了。自然经济所产生的认识论模式，乃是对独立于人的作为物质实体的自然的镜式模仿。虽然具体事物不再被认为是对理念的模仿和分有，但其在认识论上的地位仍低于抽象概念。传统心理学一般采用的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正是这种自然认识论的体现。这种方法在研究中“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7页）它从“完整的表象”或“生动的总体”出发，比如主观感觉、具体反应、日常经验和社会现象为起始，从分析中蒸发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知觉、动机、人格、利他行为等变量，进而发展出变量间的抽象函数关系。此即传统心理学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论逻辑。

心理学从作为“一切心理现象的基础和源头”的感觉这个具体的、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如果抛开产生感觉的“它的对象的存在”，感觉就是一个抽象。现实的人并不只是自然界的产物，而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这就要“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同上，第126页）这提醒我们，从对具体的直观出发，然后将之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往往只能在自然认识论的物相水平上把握对象。而从具体到抽象就是去归纳种种看得见的具体“表象”之上的看不见的抽象“真理”。它把现象从其原来所处的人类活动的复杂织物中的确切位置强拉硬拽出来，然后将之作为一种独立存在进行描述、解剖和分类。（cf. Brown & Stenner, p. 2）

## 二、传统方法批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肯定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逻辑。这种经济学研究是从同样是看不见的、但实际上客观存在的抽象的规定出发，然后再回到一个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是一种“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里的“看不见”不再意味着由于作为抽象概念而看不见，而是作为无法通过感官现成性把握的“客观抽象”而看不见。它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客观关系。而恰恰由于其“看不见”，才往往被心理学研究忽视。这种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开始的科学方法，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这些客观抽象出发，再逐步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并形成各种现代经济学体系。（参见张一兵）它至少在以下三个层面上有助于深化对传统心理学及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

首先，如果在解读心理的逻辑时，从具体归诸抽象，把目光定位在物的逻辑上，崇拜看得见的肌肉收缩、腺体分泌，乃至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到的脑区激活等自然对象，把心理也仅看作是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一种更复杂的表现方式，由此将之处理成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具有内在固有属性的自然对象，那么所得出的必然是经验主义拜“物”教的结论。然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出发点已不再是以感性形式直接呈现的“物”，这个作为起点的“抽象”也不是作为思维能力的主观抽象，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种客观历史抽象。这种历史性判断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

生产对自然和社会的传统关系的完全颠倒之上。以工业为主导的现代性生产已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认识论与心理学。物相第一次直接是人类实践的世界图景，人们面对能动的工业实践，更深刻地超越感性直观，面对周围物质世界越来越丰富的本质和规律。如果说农业生产中建立在人对自然对象的简单选择和加工之上的对世界的认识还是一种自然认识论，那么工业生产则创造了以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主体的历史认识论。先前直观的自然对象第一次直接成为人类全面支配的对象被历史性的人类活动彻底重塑了。社会及活动于其中的人的心理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界的一个部分或其较为复杂的进化阶段。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由现实的工业塑造的现实存在的“看不见的”客观抽象。

在这种全新世界图景中，社会存在包括心理存在不是直观的作为自然对象的物，而是作为客观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心理学现在要面对的正是感官无法直接把握的作为客观抽象的关系与功能性属性，而不是直观的物质实体。同样，心理学面对的其实就是不能用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观察的社会关系。诸如动机、人格、情绪情感，以至记忆、注意、学习都是作为客观抽象的社会关系。正因其非直观性，在具体研究中它们都被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或其较为复杂的进化阶段而现成性地把握了。基于自然认识论的传统心理学将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处理成独立的物质实体，由此将之转换成可见的直观操作性定义，乃至一目了然地可以看到活体脑的内部的脑成像，然后搜集这些直观之物的“统计学上的数字”，继而这些数字就被归之于一开始的诸如动机、人格等作为客观抽象的看不见的内在属性，以此揭示了肉眼看不见的心理隐藏的力量和秘密。把对象作为独立的物质实体，然后从其看得见的现象中抽取或归纳出这一物质实体的看不见的本质特征。这就是传统心理学研究经验抽象方法论，即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路。而且这里存在着一个心理学家的狡计：基于对可见变量的操作获得的某种量值被直接等同于不可见的作为客观抽象的关系性质。它表现在诸如将白鼠在迷津中的第N次成功转弯界定为“学习”的这类研究中。

作为客观抽象的“心理”是现代心理学的真正起点。心理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作为人类生存的主观方面，其表象也是自古有之。但在现代心理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心理，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换言之，作为“心理一般”的心理是现代的发明。心理本身有一个不断实现自己完整内容的历史过程。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只有具体的各种不可通约的心理表象，而没有纯粹的心理，即心理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5页）正如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而在（工业不发达的）俄罗斯人那里却“表现为天生的素质”那样，心灵现象在工业时代是作为社会历史产物的心理一般，而在前工业时代却被包含在作为自然的灵魂之中。如果说在前工业时代灵魂还依傍于生命力、上帝或其他坚固的实体，那么现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心理学通过把握心理一般，而不是普遍的“永恒的绝对者”，就能获得关于自身的全部秘密。对任何种类心理的等量齐观，其前提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实在心理种类的总体，于其中任何一种具体心理都不再具有支配地位。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心理这一概念才真正实现了其自身的全部内容，即心理一般成了一种实际真实的东西。正是在此意义上，“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同上，第42页）如是心理就不再只是像过去那样在其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正基于此，现代心理学才有了研究的可通约性和结论的可推广性。

心理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对具体的心理总体的精神结果，即这种抽象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概括

的结果。对任何种类的心理的同样看待，正适合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物质生产劳动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页）所以这种劳动所需要的心理素质也就是无差别的，它就是心理，既不是心灵，又不是活力，也不是灵魂，而既是这种心理，又是那种心理。这种心理素质（从泰罗制的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到新自由主义下的心理弹性）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而“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所以若把心理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心理就只剩下一点：即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两者都是同质的“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需要的是同一种心理一般。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一般，人口的心理特征才可能以编码的方式被规范化，它包括积累和总结数据，并将之平均化和常模化，然后进行比较、评价和评判，并据此决定针对它的矫正、治疗、规训、隔离或者最优化等各种治理技术。在资产阶级社会最现代的表现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典型。《钟形曲线：美国生活的智力与阶级结构》可谓该过程的详尽体现。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在书中强调了可被准确测量的，超越种族、语言和国界的智力在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以基因科学的名义宣称智力主要是由遗传数据决定的，而且不同种族的智力差异呈正态曲线分布。在这里，表现为一定人群在测验所测特性上的普遍水平的心理一般，直截了当的心理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心理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即客观抽象。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的发明，智力、人格这样的心理学范畴不是现象多次重复的经验抽象，而是人类一定历史性生存的具体现实关系。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无差别的心理素质。故而作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那个抽象的起点，心理一般这个被现代心理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页）

### 三、上升到“具体”：勘破“心理一般”的双重幻象

其次，即使抓住心理的社会关系范畴，将之作为客观抽象，作为以关系形式存在的心理一般，但若把心理的本质仅仅理解为一般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心理一般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前提与旨归，而不是从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对其的塑形层面理解心理一般范畴的合理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那么心理学将仍仅停留在比前一层次（自然唯物主义）稍高的社会唯物主义水平。这就意味着心理一般也可以被视为物相的极端表现，作为物相的复杂形式，“社会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比自然唯物主义更加宽松的尺度，即在能够看见的事实的基础上，为看不见的事实留下一些余地而已。”（邓晓芒，第46页）如果心理一般的线索不沉降到历史关系的具体层面，就无法完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跃迁，也就无法勘破心理一般带来的双重幻象：一是对心理一般的社会历史本质无思的意识形态。二是心理一般本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如何颠倒地表现为作为“我们本身的产物”的事物（sache）与事物的关系，并被物化错认为似乎与人无关的自然属性。

就第一个幻象而言，固然正因为心理是一个抽象范畴，它才适用于所有时代。但“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利他行为”就是一例。从真实的历史出发，就会发现原始公社的“利他行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利他行为内涵迥异。利他的一般心理学定义是“旨在提高他人福祉的动机状态”。（cf. Darity, pp. 87-88）在历史早期的各种形式中，它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而作为心理一般的利他行为只有在“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即资产阶级社会

才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实现了自己的完整内容。在婆罗洲的达雅克人那里,部落成员之间,甚至活人与死人之间都存在着普遍性的利他行为。布留尔精确指认了“那个把活人与死人联在一起的密切联系和他们双方的相互效劳……他们认为,假如活着的时候,是互相帮助的,则死亡也不需要割断那些相互效劳的联系;活人可以供给死人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死人也可以表现得同样慷慨,赠给活人具有巫术性质的药品、各种各样能帮助活人的驱邪符和护身符。”(列维-布留尔,第391页)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行为界定为利他,但这种利他实际上只是普遍的社会性的具体表现。独立的个人尚未分化出来,他根本不可能离开族类而生存,仍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如家庭和扩大成氏族的家庭),并作为其附属物与其中每个人(甚至死者)发生全面联系。但利他行为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预设了一种个人权利,然后才谈得上对这种权利的让渡,产生利他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心理学上,利他行为总是在与心理利己主义,即提高自己福祉的动机的对照中呈现。实际上利他作为心理一般得以成为现实存在的客观抽象就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页)这种新型社会关系造成了个人与社会间的深刻分裂。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自我保存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落实到每一经验个体的理性以维持其自我保存为目的,实际内容就是对对象的计算和支配。而这种自我保存理性必然将导致以自私自利的个体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参见张双利,第71页),无法达及达雅克人部落里的那种普遍的社会性。所以列奥·斯特劳斯才认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大弊端之一就在于不是把律法而是把个人权利视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参见陈家琪,2008年)正是在对这种压倒性的个人权利的反拨之上,利他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粘合社会的一般的手段,成为现实存在的客观抽象。据此方能理解康德所谓个人必须对其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族类所负的独特责任,即人类社会要“联合成为一个伦理的共同体,这是一种特殊的义务”。(康德,第155页)而利他行为正是这种伦理共同体的一种粘合剂。这也就明白实证主义的鼻祖孔德缘何发明利他主义这一术语,并以这种道德方案疗救现代社会的弊病了。故此,“利他行为”实乃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这种历史规定常被传统心理学假象式地表述成与自然现象类似的研究对象,并将其当作研究起点。心理一般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由此变成“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也就认证了“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在这个心理一般的掩盖下,心理和行为社会历史的具体运动和规律“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同上,第24页)

就第二个幻象而言,在社会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已可指认心理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作为客观抽象的人与人的关系。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关系如何成了“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的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页)换言之,心理一般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却如何发生了一种事物化颠倒,继而将人性物化错认为降格了的物性?

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通向价值实现的道路是交换。生产首先不是为了使用,而是只有交换并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商品所代表的价值。这导致了心理本身的“二重性”。它意味着同一个心理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即创造事物使用价值所需的具体心理,和形成供交换之用的价值所需的抽象心理。具体心理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它充满差异性、丰富性和创造性。而抽象心理则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的心理学抽象,心理一般在现实中硬化成真实的抽象,即为抽象心理。其抽象正体现在它所有组成部分的可交换性和同质性之中。在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人与人之间失去

了其直接性社会关系。人们本身心理的社会性质被反映成商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人与人的直接主体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的间接客体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物的属性，是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71页）代表社会生产关系的心理一般，“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心理学家常陷入这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東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3页）心理的社会历史性质被误认为物的自然属性。心理一般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就变成一般的自然关系，一种独立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自然物相。这种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的必然结果就是传统心理学将心理作为自然物进行的各种自然主义研究。人们首先追逐的是形成供交换之用的价值所必需的抽象心理，而具体心理虽是心理的本然规定性，却因其自身不利于交换的异质性反倒被排除在外。“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页）作为具体心理的各种心理首先是异质的，较难量化通约；而当作抽象心理却只是异量的，排除了任何在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的具体心理规定，恰好又为心理学的自然主义研究提供了必需的“量值”。心理在它表现为形成供交换之用的价值所需的抽象心理的限度内，失去了作为具体心理的创造要素和个人规定的那些特征，成为可以进行定量规定和科学研究的一般对象。在心理被认作现成的、给予的、不依赖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自然物的地方，在抽象心理为其提供了数学化的精确研究所必需的量值的地方，心理仍被局限在自然主义的牢笼中，它被视为与自然过程相似，此即心理的“似自然性”：心理活动有似自然界运动一样的客观规律，而且通过量化才能合法地表征。

另一方面，在交换过程之外，心理一般的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还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摩登时代》中工人查理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拧紧六角螺帽。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主观任意性”都被标准化的操作方法排除掉了，拧紧螺帽所需的仅仅是行为主义的“肌肉感觉”这种抽象心理。这种抽象心理最后完全吞噬了工人的具体心理，以至于他在街上见到女士衣裙上的六角纽扣都要拿扳手去拧上一拧。

如果说在卓别林的时代，心理还只是生产过程的要素之一（比如马克思讲的“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那么对当前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心理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生产转向了心理本身的生产。心理成为生产要素本身，甚至是根本性要素。生产心理，即心理的生产，在概念上和现实上是晚近的发明，主要表现在心理本身成为资本，成为商品，成为权力，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弹性形式等各方面。心理的生产意味着生产是“心理性的”，而心理也是“生产性的”。它突出地体现在服务业时代员工要在工作中表现出令组织满意的情绪状态这种新型的“情绪劳动”中。这种抽象心理成为生产本身，而员工具体心理之作用无非是如何更好地促进这一过程。在这里，作为抽象心理的情绪劳动既是全部的生产资料，也是唯一的消费商品。心理的生产已经是心理的消费，心理的消费已经是心理的生产。

抽象心理作为一种生产性力量开始通约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过程即心理学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询唤”和福柯的“凝视”都曾论及这种对个体存在方式的各种可能性的指导与规训。而心理学化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普遍存在的抽象心理对具体心理的统治。它既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又表现在交换过程中；既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又表现在传统心理学的研究中。资本主义生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不断心理学化的过程。本来具体心理是在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的心理的本然规定性，是真实改变心理对象的创造性活动，而抽象心理不过是具体心理的一种一般等值

规定,然而现在抽象心理却成了一切具体心理的统治者。抽象心理是“死劳动”的表现,必须吮吸代表着“活劳动”的具体心理,方才有生命,并且“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0页)它正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颠倒关系的心理学化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同上,第344-345页)资本主义的心理逻辑在于通过心理生产这种模式所形成的普遍化和抽象化心理压制具体心理。抽象心理的统治功能就在于它没有固定疆界,摆脱了具体心理的文化的、种族的或地域的限制,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它创造出一种普适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世界心理学”,并以在第三世界的心理学实验室和日常生活中被不断复制的形式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具体心理则在资本主义心理生产的普遍性逻辑统治下变得贫乏、肤浅、被动,丧失了内在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创造性。

最后,如果把心理的逻辑直接定位为自然主义的“物”的逻辑,并试图基于一种人的生命本性或尊严与价值的角度,从由非历史的拜物教观点所延伸出来的(从崇拜客体的“物”到崇拜主体的“抽象力量”)抽象的主体价值出发对这种逻辑进行批判,那就很容易在批判的基本思路上走向抽象的、神秘的人本主义。不能脱离具体生产关系,从生命本性的失落的视角解释心理一般的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因为这势必导致一种比其更具迷惑性和更难摆脱的神秘主义。吊诡的是,恰恰是在人本主义似乎以高贵的“精神传统”超越了“抽象心理”的地方,在它以充满人文关怀的美装颂扬人的正面本质和价值,批判传统心理学的非人化和无个性化倾向之处,由于它避免触及历史性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反倒作为更时髦的替代性消费品成为一种新的抽象心理,以及资本主义心理生产的更为隐秘的共谋。

至此,心理一般的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资本主义心理生产的普遍化,心理学的自然化,看得见的物质的“脑区激活”和看不见的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搅和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心理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马克思,第940页)

#### 参考文献

- 陈家琪,2008年:《伦理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重读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载《同济大学学报》第2期。
- 邓晓芒,2006年:《对“价值”本质的一种现象学思考》,载《学术月刊》第7期。
- 康德,2003年:《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1995年:《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2年、1972年、1974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 列维-布留尔,1985年:《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
- 张双利,2014年:《理性何以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载《学术月刊》第3期。
- 张一兵,1999年:《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1857—1858年手稿〉导言解读》,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
- Brown, S. & Stenner, P., 2009, *Psych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London: Sage.
- Cassirer, E., 1961, *The Logic of the Human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rity, J. W. A. (Ed.), 2008,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李登贵